

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

● 曠新年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穩定壓倒一切」和「不爭論」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基本國策」不容討論。在這種環境中，《大國空巢》及其「新人口論」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易富賢：《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憑藉人口(而不是資金、技術、資源)的優勢成為了世界工廠。我們從小由教科書而習慣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說法。當我們討論大國崛起的時候，卻忽視了一種日益臨近的危機，那就是也許有一天，中國

會淪落為小國寡民。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十九世紀初的40%，下降到二十世紀初的25%，現在不到20%，而近年來，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着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還將急劇下降)。然而，由於晚婚晚育，每年中國的出生缺陷兒數量卻約佔全世界的20%^①。

如果中國繼續現行的人口政策，到2030年，印度就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際上，如果印度在獨立之時沒有被肢解成幾個國家的話，那麼印度的人口早已超過了中國)。一百年後，中國將不到5億人口，二百年後，將只有1億左右的人口。正在崛起的中國可能因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潰，數千年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將變為無足輕重的民族。蘇聯解體的原因眾說紛紜，一種解釋歸因於人口因素：蘇聯由於破壞了依附於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從1930年代開始下降。

伴隨着改革開放，中國面向西方打開大門，體現新馬爾薩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觀點的《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因

境的報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在中國流行；與此同時，嚴格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有關人口的預言和政策紛紛以「科學」的名義出現。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新馬爾薩斯主義預言的陰影裏。在「穩定壓倒一切」和「不爭論」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基本國策」不容討論，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在這種環境中，易富賢的《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以下簡稱《大國空巢》)一書及其「新人口論」橫空出世，產出了巨大的震動，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對於人口增長持一種悲觀主義觀點，認為人口增長與物質匱乏的矛盾無法解決。這種悲觀主義典型地反映了牛頓時代的機械唯物主義思維。相反，易富賢的「新人口論」是一種樂觀主義思想。他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與現代人類文明、現代科技、經濟的發達同步，人口的增長帶來技術的進步，人口的爆炸導致科技的爆炸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從採集文明到遊牧文明，從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人類文明每前進一步，都伴隨着人口密度的規模性增長。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中曾經這樣描述人口集中所帶來的結果：「像倫敦這樣的城市，就是逛上幾個鐘頭也看不到它的盡頭，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開闊田野的些許徵象，——這樣的城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這樣

大規模的集中，250萬人口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格里斯伍爾德(Daniel T. Griswold)說，美國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質量的上升成正比③。自從人類跨入現代文明，世界人口才開始大規模穩定增長。世界人口1830年為10億，1930年為20億，1960年為30億，1975年為40億，1987年為50億，1999年為60億④。

《大國空巢》中最重要的一章是第七章：「大國崛起的人口因素」。作者從人口學的角度重新解釋了大國的興起。荷蘭人創造了現代國家、股份制度和海上貿易，但是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在荷蘭，而是發生在英國，這是為甚麼呢？作者的解釋是，荷蘭人口太少。英國特殊的人口再生產方式促進了物質再生產，引發了工業革命。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產生了農業革命，引起了全球人口爆炸；而人口爆炸最厲害的英國領導現代文明，發生了工業革命，建立了一個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英國本土以及英裔人口從1500年的400萬擴張到現在的2.15億。俄國的崛起也有類似的情形，其人口從1500年的600萬擴張到現在的2.89億。英國和俄國這兩個國家還「爆炸」出了兩個超級大國：美國(源於英國)和蘇聯(繼承俄國)。

同為歐洲大國的英法兩國卻構成了鮮明的對比。1500年法國人口1,600萬，英國(包括現在的英國和愛爾蘭)人口400萬。至1800年，英國人口增長4.1倍，法國人口增長僅1.7倍。英國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引起了英國三十二歲

「新人口論」是一種樂觀主義思想。作者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與現代人類文明、現代科技、經濟的發達同步，人口的增長帶來技術的進步，人口的爆炸導致科技的爆炸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大國空巢》中，易富賢提出：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續發展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他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

的未婚小伙子馬爾薩斯的憂慮，遂於1798年發表了《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但是英國方面沒有接受馬爾薩斯的理論，英國人口不斷增長。從1500到2000年的五百年間，英國人口增長53.5倍，本土增長16.2倍。與此相對照，法裔人口增長不到6倍，本土增長僅3.8倍。原來是一支方言的英語從而發展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孫中山早就注意到了英法兩國不同的命運⑤：

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從中國和世界歷史來看，人口增長往往是盛世的一個重要標誌。西方古代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國中古時代「五胡亂華」都和人口變化有關。在《大國空巢》中，易富賢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續發展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十九世紀末，當中國被西方炮艦打敗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先覺者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認為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而今天，面對人口的斷裂，中國同樣應

該有一種危機感。作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

馬爾薩斯提出的所謂「人口過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恩格斯指出：「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着的。只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⑥正如易富賢所指出的，馬爾薩斯主義雖然打着「科學」的旗號，卻與邪教有着某些共同特點：利用世界末日、戰爭、災難反人類。十九世紀中葉，汪士鐸驚呼「人多之患」，主張復族誅之法，推廣連坐之條，嚴再嫁之律，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溺女嬰，墮胎，聽任災疫流行，以減少人口⑦。

1996年，廣東農村婦女杜潤瓊接受「科學」的人口論，投毒殺害十八人，中毒無數。但她卻認為投毒殺人是為國分憂：「我讀過三年書，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家辦事是應該的。」別人問她平時笑着摸小孩的頭，又讓他們吃毒藥，是否很殘忍？她回答說：「為國搞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⑧陝西省商州市金陵寺鎮王堍村村民龍治民，1980年被縣裏授予「計劃生育先進」的稱號。僅僅五年，龍治民從受到縣長、計生委表彰的計劃生育先進模範，淪落為殺死四十八人的殺人狂，還振振有詞地辯解殺人是為了減少人口，為計劃生育工作做貢獻，是為國除害⑨。

美國學者王國斌在《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書中指出：「人們對

中國的通常看法是：該國由於人口增長超過資源，因而在馬爾薩斯主義的危機邊緣晃來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視為第三世界近代經濟發展的障礙，因而將中國之無法發展現代經濟，歸咎於其人口過多。」^⑩其實，如果過份強調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阻礙，那麼，我們就會低估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的經濟奇跡並不是通過計劃生育而大規模減少人口的結果，而是中國經濟本身持續增長的結果。印度並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並且在人口規模上不久將超過中國，但是，1990年代以來，它同樣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易富賢尖銳地指出，我們經常用人口問題和所謂「特殊國情」來掩蓋決策失誤，將中國的貧困落後歸咎於巨大的人口規模。但如前所述，這種觀點是極為荒謬的。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正因為它是一個人口大國。而從人口密度來說，英國、意大利、德國、日本、韓國、朝鮮、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越南等國都比中國要高。兩百年前，中國人均資源相對於世界平均水平來說是最少的，但那個時候中國卻是乾隆盛世，不論是綜合國力，還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國都領先於世界。

《大國空巢》的「新人口論」建立在一種新的發展觀上，作者由對計劃生育的反思引發到對中國幾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物本主義的全面反思。1980年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代表了以物為本的粗放型、外緣型的發展。中國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都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在五十九個主要國家資源績效水平的

調查排序中，中國資源績效排名倒數第六位。中國這種不計成本的GDP增長是以巨大的資源破壞為代價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以賤賣中國的物產資源和以更低的價格賤賣中國的勞動力資源為代價的。

1990年代以來中國盲目追求GDP增長必然導致粗放型、以物為本的發展模式。然而，GDP並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真實的發展水平。在毛澤東時代，對於疾病以預防為主，這樣不僅大大降低了醫療費用，而且延長了人的壽命，但在GDP指標上卻不能反映出來。易富賢認為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所使用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Nations Development Index, HDI，包括人均壽命預期、教育程度、國民人均收入)，作為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比GDP指標更為合理。基於此，他對歷史作出了新的解釋。

在作者看來，現代化和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人均壽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實現了大躍進。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社會飛速進步，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此時期世界人均壽命預期僅從47歲提高到58歲。1981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了68歲，接近於當時發達國家的水平；而當時印度只達到54歲。中國現在的人均預期壽命比韓國少5.4歲，可是，在197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卻超過了當時的韓國。1981年以來，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只增長了4歲，印度卻增長了10歲。儘管印度在跑步追趕中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不是因為生得太多，而是因為死得少。當時重視提高衛生水平，降低嬰兒死亡率，強調預防重於治療——是一種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

「五四」以來，中國形成了一種對「科學」權威的迷信和濫用，大躍進和計劃生育都體現了這種特點。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專家治國論」的迷信，這些所謂專家依附於權力，缺乏獨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

國，但至今仍然沒有達到中國在毛澤東逝世時的水平。

如果我們不是從意識形態的偏見出發，而是從民族的長遠利益、從人類的良知出發，作者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解釋，就不是不可接受了。作者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不是因為生得太多，而是因為死得少。如果我們將現在中國的人口壓力歸因於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實施的先進衛生制度大幅提高了中國的人均壽命。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衛生進步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高度評價。當時重視提高衛生水平，降低嬰兒死亡率，強調預防重於治療——是一種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在1950年，中國和印度的HDI基本相當；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取得了對於印度的明顯優勢。然而，從1975至2003年，中國的HDI增長1.438倍，印度增長1.461倍，也就是說，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HDI增長更快。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對人的貶低，工資總額在GDP中所佔比例逐年下降。2005年中國工資收入僅佔GDP約11%^①，而發達國家則普遍在54至65%^②。然而，中國稅負卻是全世界第二。由此可見，中國是最不重視人的國家。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0%，教育經費卻只佔世界的1%，衛生經費只佔世界的2%。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中國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為發展中國家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153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145位。而在1979年之前，中國的中小學入學比例高達95%，遠遠高於其他九十二個發展中國家。

以計劃生育為標誌的以物為本的馬爾薩斯發展觀是與現代經濟理論背道而馳的，嚴重透支了中國今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以計劃生育為賭注的這種反常發展，使得中國作為大國崛起變得不可能。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是「以美為師」，對美國亦步亦趨，竭力模仿，但是，唯獨在生育問題上，美國持鼓勵態度，而中國卻實施懲罰政策。同時，美國富人多交稅，有助提高全民素質；中國卻是窮人多交稅，犧牲他們的發展權，卻無助提高城市教育水平，上海和北京這些「第一世界」的國際都市，高考錄取分數線反而遠低於「第三世界」的落後農村。

從「五四」以來，中國形成了一種對「科學」權威的迷信和濫用，大躍進和計劃生育都體現了這種科學權威的濫用。不論是大躍進中「畝產萬斤」的神話，還是計劃生育政策中關於「人口爆炸」的預言，都有科學家為長官意志作出「科學論證」。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專家治國論」的迷信，然而，這些所謂專家依附於權力，缺乏獨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用宋健的話來說：「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對數理化自然非常感興趣，但對社會科學，那個時候，可以說我是一竅不通，領導說甚麼，我就覺得，哦，那就是真理。」^③1980年2月，新華社公布了宋健等人「花了不到兩個月時間」，「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制論」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而這樣一份替長官意志背書的報告卻影響了一個國家的長期決策。

馬爾薩斯等古典經濟學家生活在一個經濟仍然受農業所支配

的世界。在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不但經濟和文化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人性」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蛻變。人口專家沒有意識到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業，以及現代化所引起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傾向的密切關係，晚婚晚育、生育意願的降低，都會使人口的增長放慢下來，甚至停止增長。

易富賢的一個重要觀點是，1970年之後，中國的HDI超過0.5，步入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即使不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中國的人口增長亦自然會急劇下降。因此，1970年代寬鬆的計劃生育政策到1980年代應當停止，而不是強化。

適度生育的觀點一開始便受到農民的歡迎，如果有適當的節育措施，一般農民生育兩三個孩子之後都會自願停止生育。但是，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反人性和反倫理的，強制、殘酷和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嚴重破壞了人口生態，造成了民族難以察覺和不可預見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嚴重的倫理後果，而且在獲得了「人口紅利」的好處之後，不久中國將迎來一個人力資源迅速衰竭的過度老齡化社會。我們終將為這種「人口紅利」和人口生態的嚴重失衡付出無法預計的巨大代價。非均衡的人口結構將讓一個過度老齡化的社會沉重地壓在那些作為「小皇帝」生長起來的獨生子女身上，他們既無兄弟姐妹的情誼，也無叔伯阿姨的理解，未來的一代在經濟、文化、倫理、心理等各個方面都將不堪重負。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家庭。汶川大地震中獨生子女的損失給許多人帶來了深刻的教訓。尤其是，中國計劃生育所宣傳的所謂「優生學」，是為納粹政治服務的，被公認為偽科學。除了納粹德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公然讓這種偽科學來支配一個國家的政策。然而，正如易富賢所指出的，在中國，從何新、程恩富到何清漣，從所謂右派精英到左派精英，不論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有何分別，都普遍對人持一種敵視的態度，支持計劃生育的惡政。他們忽視生育權是最基本的人權。1968年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Teheran Declaration) 規定：「父母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

易富賢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新時期的經濟發展是「吃祖宗飯」，新時期的計劃生育是「斷祖宗根」。他認為，計劃生育破壞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的人倫體系。現在有些人口學家主張不生育，清朝統治者對蒙古所採取的就是這種民族弱化政策。為了減少蒙古的人口，清朝統治者大力推廣喇嘛教，不僅對喇嘛給予優待獎勵，而且從國庫中撥款修建寺廟，使得大量人口出家為僧而不事社會生產和人類生產。用清朝統治者的說法，「修廟一座，勝用十萬兵。」在唐代，強大的吐蕃(西藏)長期是唐王朝的最大威脅，人口達800萬^⑨，一度攻佔唐朝都城長安。但是，西藏同樣因為喇嘛教導致人口減少而走向衰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藏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1/233。

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反人性和反倫理的，它破壞了人口生態，造成了民族難以察覺和不可預見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嚴重的倫理後果，不久中國將迎來一個人力資源迅速衰竭的過度老齡化社會。

計劃生育政策不僅關係到中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未來發展，而且也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倫理和心理建設。《大國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觀點，有助於我們正視中國嚴峻的人口危機。

計劃生育政策不僅使中國人口總體上下降，也使人口不平衡地增長，少數民族總人口從1964年的5.77%增加到2005年的9.44%。2001至2005年這五年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更是高佔42%^⑤。

計劃生育長期以來被視為一項「基本國策」，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改革開放已經同步延續了三十年。在提倡「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時候，也許，這樣一項與我們每個人都密切相關的政策，是讓公眾進入和參與討論的時候了。這一政策不僅關係到中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未來發展，而且也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倫理和心理建設。《大國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觀點，有助於我們正視中國嚴峻的人口危機。

註釋

① 易富賢：〈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指導人口政策調整〉，《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6月上半月刊，頁88。

②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303。

③ Daniel T. Griswold, "America, 300 Million Strong" (Cato Institute, 11 October 2006), www.freetrade.org/node/514.

④ 劉少康：《環境與環境保護導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第三章。

⑤ 孫逸仙：《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600。

⑥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619。

⑦ 汪士鐸撰，鄧之誠輯錄：《汪梅翁乙丙日記》(北平：文芸閣，1936)。

⑧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272-73。

⑨ 商名：〈龍治民——從計劃生育先進模範到殺死48人的殺人狂〉，2008年7月7日，博訊新聞網，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72231.shtml。

⑩ 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6。

⑪ 〈發改委：我國的工資分配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問題〉，2007年2月1日，人民網，<http://gov.people.com.cn/GB/46737/5354398.html>。

⑫ 高二坡：〈河南個稅申報 富人偷着樂〉，《東方今報》，2007年4月16日，引自金融界，<http://money.jrj.com.cn/news/20070416/000000126384.htm>。

⑬ 曾濤思：〈堅守底線是一個人應有的情懷〉，《中國青年》，2005年4月28日，引自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8/14266519984.shtml>。

⑭ 〈從數字看西藏〉，《瞭望新聞周刊》，2008年4月14日，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14/content_7972647.htm。

⑮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2006年3月16日，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